

反對派「渾水摸魚」謀私利

□ 崔寧



議論風生

反對派在香港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如火如荼並即將產生之際，利用「民陣」這一平台，再次上街，於周六組織遊行活動，並提出「踢走爛攤子，選我真普選」口號。

從所提出的口號看，反對派是藉特首曾蔭權涉及所謂「利益輸送」風波及兩個建制派候選人此前競爭白熱化，曝出所謂「西九利益門」和「僱建門」事件，將原先預謀的主題擴大到「倒曾」，並將特首曾蔭權的「問題」與現行的選舉制度掛鉤，歸咎於「小圈子選舉」的結果。

一直以來，反對派都將香港的民主制度，尤其是特首選舉制度，污蔑為「小圈子選舉」，這是他們的一貫伎倆，並以此欺騙和迷惑市民大眾，推銷他們賴以生存的所謂「民主價值觀」。然而，隨着香港民主制度安排，按照《基本法》規定的軌道循序漸進向前發展，成為現實並取得巨大成就，「小圈子」說已經越來越沒有市場，成了反對派的舊衣鉢。

這次反對派又老調重彈，抱着舊衣鉢，組織上街，還是老一套，目的是企圖攪亂政局，破壞特首選舉，挑戰中央政府權威，以謀取他們在目前民主法治機制下得不到的利益，扭轉日益孤立和頹敗的困局。

攪亂政局破壞特首選舉

為破壞特首選舉，反對派費盡心機。早前民主黨、公民黨和工黨等還為此制定了所謂「三階段策略」。毫無疑問，這次「上街」亦是其中的「謀算」之一。然而，反對派錯判了形勢。

特首選舉雖然出現了一些人們事先預料不到的磕碰和曲折，且節外生枝，出現涉及特首曾蔭權的所謂「利益輸送」風波，但是種種不利因素並未影響選舉順利進展的總趨勢。2月29日提名期結束時，兩個建制派候選人梁振英、唐英年分別以三百零五和三百九十九提名票成為正式候選人。

在特首選舉的階段，兩人先後提出自己完整的政綱，包括《明天在你我》和《齊心一意撐香港》，並深入各階層，接觸基層民眾，了解民情，完善政策理念，使參選政綱更加貼近民眾、更加切合實際。這些其實都是民主制度務實發展的具體實踐和可喜成果。

可是，反對派推出的唯一候選人，民主黨的何俊仁，從特首選舉一開始，就不斷地鼓吹要把特首的選舉變成「民主價值觀」的競爭，企圖以空洞的理念爭論，把特首的選舉引導到政治論戰中，脫離香港社會發展實際，脫離民生基調。市民大眾並不接受這一套，何俊仁的民意支持度一直在個位數字徘徊，甚至被邊緣化。

不擇手段推銷「民主」理念

反對派為推銷他們的「價值觀」，從特首選舉一開始就大造聲勢。去年12月啓動「全民初選」，成立籌委會，並在全港市民中推動「一人一票」選舉反對派參選人的活動。儘管反對派設了74個投票站，何俊仁勝出，但民調結果卻令人尷尬，超過五成民眾對包括何俊仁在內的反對派兩個參選人都不支持。接下來反對派還要在3月23日，即特首選舉投票日前舉行一次「全民選特首」，這項活動主要由「政治學者」鍾庭耀負責操弄，他甚至想用自己的民調結果來影響特首選舉。能否達到他們的所謂「民主」「人權」目的？看來同樣只會是一場鬧劇。

去年底進行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反對派在一千二百位選委中，掌握了約二百席。由於何俊仁民望

極低，沒有人氣，完全沒有希望，反對派就想利用掌握的這些選委票作資本來達到想要達到的目的。何俊仁會一再揚言，如果建制派候選人需要「過票」的話，必須要接受反對派所提出的條件。這些條件包括了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推動所謂「雙普選」等。但結果至今沒有人理會。

左右選舉只是一廂情願

最近，反對派又藉此大作文章，企圖以不投票或投「白票」的方式，來增加特首選舉「流選」的可能性因素。繼工黨李卓人表示，其掌握的選委在選舉特首時，會以離場抗議之後，公民黨的梁家傑亦表示，反對派選委中將會有一半人不投票或投「白票」。反對派「金主」黎智英旗下的寫手，最近就在其控制的《蘋果日報》上大肆鼓吹「流選」，號召選委投「白票」，並將此形容為「上籤」。

日前，在港台《議事論事》節目中，民主黨元老李柱銘也聲稱，「如果流選，對香港有益多過有害」。為了對抗特首選舉，反對派希望「流選」，並為所動。可是反對派所能夠控制的選委票，實際上有多少呢？即使能完全掌控二百票，也只是全部選委票的六分之一，相信左右不了大局，種種企圖只能是一廂情願而已。

事關香港未來發展大局的特首選舉，已經進入關鍵時刻。反對派利用一些民眾對特首曾蔭權近期表現有不滿、對兩個建制派候選人有「負面新聞」感到困惑，而乘機以「大民主」方式推銷他們的舊貨並試圖以此挽回頹勢，只能適得其反。反對派在現實體制下得不到的利益，也根本不可能從「上街」得到。

深化改革 兩會「定盤」

□ 陳群

在全球倒春寒的大氣候中，外部環境空前嚴峻，內部改革矛盾凸顯。內外難題疊加，形勢考驗着「兩會」智慧；左右認識交叉，舉國期盼着「兩會」定盤。相信「兩會」將向深層改革進軍，穩中求進共謀發展，創新社會管理，引領中國邁向新的春天。

行，使「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舉步維艱；三是外部壓力——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世界對中國「守規則」地參與世界更加期望，而當今世界發生的種種變化與動盪也給中國帶來外部環境壓力。近日媒體多引鄧公名言：「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因此，深層改革將成為「兩會」重大主題。

穩中求進謀發展

把握穩中求進，邁向科學發展，以經濟社會發展的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八大召開，是今年「兩會」主題。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物價基本穩定、社會大局穩定，轉變發展方式、深化改革開放、改善民生。在近期各省、市、自治區地方「兩會」上，穩中求進、科學發展、擴內需、控物價、調結構、惠民生、科技創新、戰略性新興產業等字眼，頻頻出現在各地政府工作報告中。

「兩會」代表雲集北京，恰逢中國經濟步伐放緩之時。國家統計局1月公布數據顯示，2011年一至四季度經濟增速分別為9.7%、9.5%、9.1%和8.9%。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佳貴認為，「經濟增速最好保持在8%到9%之間，為深化改革、治理通脹、調整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經濟增長速度過快，會使一些深層次矛盾更加尖銳，不利於深化改革。」有專家指出，中國可以稍微放慢腳步，推進經濟社會轉型，穩中求進，讓經濟繁榮惠及更多百姓。

有民調顯示，民眾期待「兩會」十大熱點問題依次是：社會保障、收入分配、社會管理、教育公平、醫療改革、三農問題、反腐倡廉、物價問題、食品安全、房價調控。「兩會」前夕，溫

家寶、賈慶林、李長春、李克強、賀國強等多位中央領導肩負民衆期盼，分赴廣東、上海、浙江等地區進行調研，考察涉及就業、保障房建設、金融安全、進出口貿易等諸多領域，意在為改革攻堅、穩中求進、共謀發展、確保民生，掌握第一手材料。中央領導基層調研關注民衆關注的問題，使今年「兩會」更加令人期待。

創新管理有必要

在此前一個「兩會調查」中，「社會管理」的關注度已攀至第三位。中國經過三十多年快速增長，物質財富迅速膨脹，社會矛盾與不穩定因素也逐漸堆積。「創新社會管理」已提上歷史日程，不僅考驗着執政者，而且關乎中國前途命運。對此，應始終保持高度警惕。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2007年十七大報告提出「完善社會管理」；2011年中央黨校省部級領導幹部研討班把「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列為主題；同年7月1日胡錦濤在中共成立90周年大會上強調，「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叢生、繞不過……」同年8月，已有20年歷史的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更名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從「治安」到「管理」一詞之改，意味着中共執政理念的創新，這將成「兩會」又一熱點。

筆者以為，今年「兩會」如乘改革之舟行至中流，既有「中流擊水」的開闊空間，亦遭「浪遏飛舟」的嚴峻挑戰。相信「兩會」將向深層改革進軍，將穩中求進共謀發展，將創新社會管理，引領中國邁向新的春天。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唱衰中國可以休矣

□ 陶文釗

中外連線

2月27日，美國《時代周刊》網站刊登了該刊資深記者邁克爾·舒曼的一篇文章，評論中國經濟形勢。作者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可能在2014年到2015年間爆發危機。這篇文章大概是「唱衰中國論」的最新版本了。

實際上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唱衰中國」一直時隱時顯。在美國這種論調最時興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一些美國政界和學界人士認為，既然蘇聯共產黨執政七十多年的國家都可以這樣迅速地分崩離析，為什麼中國不會步其後塵？一些人公開發表文章稱，「中國處在疆土分裂、政治崩潰或民主革命的邊緣」。中央情報局高官在國會聽證會上說，蘇聯和東歐發生的事情引導美國情報部門去「想……想像不到的事情。顯然我們同樣需要考慮中國未來可能的選擇。」一些對中國非常了解的人也認為，中國的「現政權顯然只是過渡性的政權」，到本世紀末中國就會起大變化。但中國發展卻出乎他們的意料，中國非但沒有垮，而且在鄧小平南巡以後掀起了改革開放的新高潮，經濟持續高速發展。

中國走適合自己的路

「唱衰中國」並沒有銷聲匿跡。到了九十年代末，這種理論又冒了出來，當時主要的說法是：國有企業缺乏競爭力，銀行「壞帳如山」，已經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行將倒閉，長期的經濟衰退不可避免。但這些人的預言又一次沒有兌現，中國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比較成功地解決了這些問題，繼續保持了經濟增長的勢頭。

舒曼的說法把中國與所謂亞洲模式聯繫起來。按照他的說法，既然中國遵循的是以投資拉動經濟的亞洲經濟模式，既然日本和韓國都曾發生過危機，中國也在一步一步地滑向危機的深淵。且不說有沒有什麼亞洲模式，難道歐洲的模式或美國的模式就一定好嗎？歐洲現在不是面臨着嚴重的債務危機嗎？而且這個危機的解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至於美國，此次世界金融危機不就是由美國過度金融創新、放鬆監管、次貸危機引起的嗎？文章的說法有點像「危機人人有份論」，既然美國有危機，歐洲有危機，亞洲的日本和韓國都曾發生過危機，中國也難逃危機，這就是作者的邏輯。其實，中國經濟的發展不是在遵循什麼已有的模式。對於人口如此之多、家底又如此之薄的經濟體來說，中國必須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這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摸着石子過河」的道理，這也是中國過去三十二年的實踐。

以經濟增長說明一切

對於舒曼文章中提到的具體問題，限於篇幅，本文不能一一進行剖析。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確實面臨着一系列嚴峻的挑戰，諸如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社會老齡化、內需不足，發展過多依賴投資和勞動力的投入，等等。國內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惟其如此，我們才有倡導科學發展觀，「十二五」規劃才把調整經濟增長模式作為主要任務。但中國人的結論是我們能夠成功實行這種調整，把經濟發展持續下去。不但在二十年機遇期內可以實現持續高速增長，而且還可以延長機遇期。這也是國際上的主流看法，如最近世界銀行的報告就是這樣。

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民眾和媒體已經足夠成熟，不會因為聽了「捧煞」中國的話而忘乎所以，也不會因為聽了唱衰中國的話而義憤填膺。美國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社會，對同一問題有不同見解是正常的。實際上就在前幾天，在《華爾街日報》網站上就以《唱衰中國的預言家為何屢言不中？》為題發表文章，從投資、房地產、影子銀行、勞動力、債務水平等五個方面批評唱衰中國的看法。我們會冷靜地對待所有這些看法，只要其中多少有合理的成分我們都會加以參考借鑒，因為，對「唱衰中國」最好的回答就是中國經濟增長本身。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神州點面

「兩會」在料峭寒春中開幕，意義不同往年。國人少了幾分「煙花三月下揚州」的愜意，多了些許「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蒼勁。從2008年開始，以美國次貸危機為發端，發酵至當今的美、歐國債危機，全球經濟經受着長達四年的倒春寒。中國改革開放三十三年，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在全球倒春寒的大氣候中，外部環境空前嚴峻，內部改革矛盾凸顯。內外難題疊加，形勢考驗着「兩會」智慧；左右認識交叉，舉國期盼着「兩會」定盤。國人期盼中國龍年躍龍門，希冀「兩會」書寫新春天的故事。

深化改革成共識

今年「兩會」恰逢鄧公「南巡講話」二十周年。《人民日報》推出「深化改革認識論」系列文章，疾呼「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發布報告稱「中國急需深層次改革」。「寧要微詞，不要危機」的警式語，表明了中共高層態度。

從理性講，改革開放不是問題，多少反對改革開放呢？但實際上，改革開放問題不少，引發了深刻而尖銳爭論。新華網的文章指出，一是民間改革力量積聚——改革開放源自安徽小崗村農民，現今這種自下而上的改革內在動力又有了相當積蓄；二是經濟改革迫在眉睫——政府力推經濟轉型，但既得利益者消極懈怠、特殊利益集團阻撓掣肘等等，都讓深層經濟體制改革躑躅難



神州點面

近日，北京某大學的一個學術小組公布了一組「2011年中國電影國際影響力全球調研數據」。這些醒目的數據表明：在接受調查的9個國家、18個語種的海外觀眾中，半數以上的受訪者對中國電影知之甚少。僅有20%的觀眾對中國電影較為關注，而認同中國電影具有影響力的更是降至8.6%。也許，這項調研在採集數據的方法上可能還存在着某些缺陷，但它所反映的基本事實卻的確應該引來中國影視界同仁的幾分震動；同樣，也能給那些對中國文化產業有着掌控力的人們帶去幾分清醒。

「衝擊」有助提高水平

然而，筆者以為，真正能給國人帶來震動與清醒的，恐怕還是月前中美就「允許更多的美國電影進入中國市場並提高美國片方分賬比例」達成的協議。按照這份協議，中國將在原本每年引進20部美國電影的基礎上再增加14部IMAX或3D電影。同時，美方的分賬比例也從原來的13%提高到25%。毫無疑問，這份協議的出台意味着中國電影市場的大門在國際化遊戲規則制約下被進一步推開，意味着中國觀眾可以看到更多的美國大片；也意味着，中國電影的生存空間在一個不會太短的時間內將受到擠壓，而這擠壓的背後則是中國電影在藝術質量與市場經營方面所必須應對的挑戰與考驗。難怪筆者的

中國電影需苦練「內功」迎挑戰

□ 秦曉鷹

一些影視界朋友在得知此消息後，通電話中說的第一句就是，「狼」真的來了。

那麼，荷里活這隻「狼」會「吃」掉我們什麼呢？

筆者以為，從短期來看，它無疑將要「吃」掉一部分中國國產片原有的市場份額和利潤，這當然會很痛。以2011年為例，中國電影全年票房為130億人民幣，其中國產片70億，進口片60億，國產片除「勝」。但就進口片單片票房來說，收入卻遠超國產片的單片票房。可以想見，進口片數量及分賬額度增加後，國產片票房會有很大部分被荷里活「瓜分」掉。

當然，對那些靠僥倖，靠所謂的明星陣容，靠吃老本，靠黑手操作市場，靠竊測政治風向，靠國家財力支撐，去套取某種「成功」桂冠的電影製作者和電影投機商來說，也同樣具有相當的殺傷作用。從長痛與短痛的辯證關係看，這種衝擊對提高中國電影的整體製作水準，對堅持電影規律的正派的製作者來說，最終將是一件幸事。

道理儘管如此，但面對着美國進口大片的來勢洶洶，如果不下苦功、不做扎扎實實的努力，要想使挑戰變為動力、把危機變為機遇，仍然是一廂情願。只有方方面面戮力同心，克服種種政策性障礙，擺脫種種觀念上的羈絆，千方百計調動起中國電影藝術家們的創造性，煥發出他們身上蘊藏的創作靈感，才能真正拓展生存空間，從而逐漸擺脫窘境與困局。

中國電影要擺脫困境，毫無疑義是要極大地提高中國電影藝術家和大大小小的製作團隊（包括編劇導演製片演員攝影及所有輔助人員）的基本素質。人的變化是基礎性變化，是一種原發性的內生動力，即人們常說的「內功」。只有苦練這種「內功

」，只有電影人的素養的提高，才能使中國電影的整體水平躍升到一個可以與世界電影大國打拚較量的新高度。

那麼，當前中國電影人急需提高怎樣的素質才能有力量有效地應對進口大片的衝擊呢？筆者以為應該從兩個方面下功夫：

首先是要深入了解和感受正在發生巨大歷史變遷的中國。中國正在經歷着千百年未有之劇變，這種變化大到影響着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小到波及到每個中國人的命運和每個中國家庭的生活軌跡。它帶來日新月異的驚喜，也帶來瞠目結舌的震撼。無數的悲歡離合無盡的尋覓追求無窮的人間活劇，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只要我們的電影藝術家能走出固有的小圈子小巢穴小情調，就能夠找到極其豐富的創作土壤和極其豐沛的情感源泉。

學用「國際化語境」

其次，就是要努力學會用「國際化語境」來表現民族文化。我這裡說的「國際化語境」是指能夠讓世界其他國家、地區、民族所能接受的表現手法、形式和敘事邏輯。如果說得更深一些，則是在「國際化語境」中普遍具有的、在人類進步的歷史長河中形成的共有的人性追求、審美情趣與認知判斷。正是這些理念的存在才能使世界上不同民族種族國家和地區的人們產生廣泛的文化認同，也才可能有相互理解、相互溝通、相互交流、相互學習與相互欣賞。這，就是筆者所指的「國際化語境」。我相信，只要積極地把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元素與「國際化語境」加以結合與融通，中國就能逆風起飛，成為新的電影大國、電影強國。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